



John Steinbeck

斯坦贝克文集

愤怒的葡萄

胡仲持 译

斯坦贝克文集

John Steinbeck

愤怒的葡萄

胡仲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愤怒的葡萄/(美)斯坦贝克(Steinbeck, J.)著;
胡仲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3
(斯坦贝克文集)
书名原文: The Grapes of Wrath
ISBN 7-5327-3003-4
I. 愤... II. ①斯... ②胡...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856 号

John Steinbeck
THE GRAPES OF WRATH

Copyright © 1939 by John Steinbeck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1-18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斯坦贝克文集
愤怒的葡萄
〔美〕斯坦贝克 著
胡仲持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字数 451,000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600 册
ISBN 7-5327-3003-4/I·1744
定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 给
卡 罗 尔

是他促成我写了这本书

献 给
汤 姆

他经历了书中的生活

译 本 序

《愤怒的葡萄》是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三九年。这部作品描写美国三十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故事,反映了惊心动魄的社会斗争的图景。小说饱含美国农民的血泪、愤慨和斗争,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农民的史诗,也是美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名著。

斯坦贝克是加利福尼亚人,生于萨利纳斯谷地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自小生活在乡野,在牧场劳动过,对于山区的自然景色和贫苦的农民十分熟悉。他还当过助理药剂师和筑路工人。他家里有不少藏书,他喜欢看欧洲和美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他断断续续读完大学之后,依靠自学进行创作,最早的小说描写英国历史传说中的故事,但并不成功。后来他以他所熟悉的山区农民的生活为题材,走上了创作的道路。

斯坦贝克的成名作是《煎饼坪》(1935)。作品突出流浪农民无忧无虑的心情。这些农民喜爱宁静的生活方式,并不向往财富,不愿意“为所有制的责任感所压倒”,讨厌“背上有财产的压力”。斯坦贝克还歌颂流浪汉之间互助友爱的情谊。这一切与贪婪倾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对照。属于这一类的小说还有《小红马》和《人与鼠》。《小红马》于一九三七年发表,包括三个短篇,一九三八年收入短篇小说集《长谷》时增加了第四篇。这个中篇小说以少年儿童乔迪为主人



公,描写西部的牧场生活。小说始终从孩子的角度去观察世界;通过对马的生、病、老、死的描写,表现一个少年儿童的成长。小说中对乔迪的父亲、母亲和牧场工人贝利等三个人物的描写也十分逼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人与鼠》发表于《小红马》的同年,是一部优秀作品。两个流浪农业工人莱尼和乔治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朋友。莱尼力大无比,但智力不全,饮食起居全靠乔治的帮助。他们梦想将来能有自己的小农场,“有一间房子”,“养几只小动物”。斯坦贝克说这“不是精神失常,而是代表所有的人的模糊而强烈的愿望”,但这样低微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农场主的儿子多次侮辱莱尼,他的妻子又去勾引他,莱尼无意中掐死了农场主的儿媳。乔治含着眼泪亲手打死莱尼,不让他惨死在压迫者的枪下。《人与鼠》突出下层人民的梦想和他们之间真挚的情谊,又把他们的不幸放在阶级对立的背景之中,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人与鼠》像《小红马》一样,人物的思想极其单纯善良,情绪和愿望都是单一的,对自然景色怀有深深的眷恋,这一切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构成斯坦贝克早期创作的艺术风格。

《相持》(1936)描写农业工人的罢工斗争。某苹果园条件恶劣,工资低廉,工人十分不满。共产党员麦克前去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果园主使用种种手段破坏罢工,麦克等人商量对策,使斗争坚持下去。小说结尾时双方“胜负未决”。小说表现的斗争是激烈的,对统治者的揭露也是充分的,但对共产党人的描写很有保留。麦克被写成一个粗暴的、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罢工组织者,惟以煽动群众情绪为乐事。作者把人道主义的同情与罢工斗争对立起来,通过一个医生的口声称“我关心的是人,不是事业”。这多少削弱了主题思想的鲜明性。这一缺陷在《愤怒的葡萄》中有所克服。

一九三七年,斯坦贝克访问过一次北欧和苏联,回国后,继续在西部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到过欧洲战场,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顾问。一九四七年又访问了一次苏联。四十年代,他除了通讯报道之外,发表的小说主要有:《月亮下去了》(1942)、《罐头

厂街》(1945)和《珍珠》(1947)等。《月亮下去了》是反法西斯作品,写北欧一城市被德国占领后的故事,小说在北欧获得好评,虽然美国批评界有所保留。《罐头厂街》和它的续篇《美妙的星期四》(1954)回到他早期的乡土风格。麦克等一伙流浪汉身无分文,日子却“过得比总统还惬意”。小说颂扬那种开朗、乐天的生活方式,以对照社会的倾轧与狭隘,但小说渲染的诙谐、抒情气氛显出夸饰的痕迹。

《珍珠》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根据墨西哥一个民间传说改编。印第安渔民奇诺在海里捞到一颗“晶莹明亮、光彩夺目”的珍珠。他满以为他的一切愿望(孩子有钱治病,穿着新衣服去上学,他自己买一把新的鱼叉等等。)都可以实现,结果是商人们串通一气,说它不是真货。晚上他家里受到袭击,房子被烧掉。他与追捕者搏斗时,他的儿子中弹而死。珍珠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招来横祸。他和妻子回到海边,把珠子扔进大海。奇诺刚毅不阿的性格、他斗不过强大的恶势力但决不向他们低头、他抛却财富但求安宁……像是清新的空气,驱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污浊气味。

五十年代初,斯坦贝克离开他熟悉的加利福尼亚,迁居纽约。他五十年代的创作不甚成功。晚年的重要作品有《烦恼的冬天》(1961),描写社会道德的沦丧。从这部作品里,看得出作者对美国社会精神面貌的忧虑。正如斯坦贝克在一部游记里所说,战后的美国社会是富有了,“见不到三十年代那种咄咄逼人的、可怕的贫穷”,但产生了“一种厌倦的情绪,一种消耗性的病症”。

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四年,获“总统自由奖章”,以表彰他在“和平时期的贡献”。他于一九六八年去世,去世后他的《书信集》等遗作相继出版。

一九三七年秋,他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沿途见到流浪的农民处于绝境,感到非常震动:“有五千户人家快饿死了,不光是挨饿,是快饿死了”,“问题非常尖锐”。这时他觉得他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写农民的悲剧,要为他

们说话。这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动机。

《愤怒的葡萄》以经济危机时期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俄克拉何马和邻近的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过剩的劳力压低工资,各种地方势力又横加勒索和迫害。

作者描写的乔德一家是其中的一户。这家人被“拖拉机”赶出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之后,将家中一切变卖掉,换来一辆破旧汽车,一家十三口人坐车向西逃荒。途中年老的相继去世,年轻的离散。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时,一家只剩八口,处于贫穷无业的境地。

小说突出描写这些破产农民的互助友爱的精神。互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作者通过人物的口强调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与奢侈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坦贝克笔下的农民并不停留在互相支援这一点上。他们以切身的经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提高,体会到团结战斗的重要。小说有三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凯西是一个牧师,随乔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大批农民破产、逃难的形势下,思想发生变化。他口头上虽说“人人都有罪”,心里却感到这是一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过、被捕入狱之后,懂得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成了一个罢工组织者,教育新老工人团结起来,警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凯西虽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传的道理、表现出来的英勇的行为使许多人受到教育。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不慎打死了人,蹲过监狱。出狱之后,他随家里人西迁,成了全家主要的劳动力。他性情耿直,见义勇为,敢于同欺压人的现象进行斗争。凯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个警察。他经过几次斗争,总结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并没



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最后他走上凯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

第三个人物形象是乔德的母亲,她是家庭的主妇,也是一家人的灵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发生动摇,她却始终满怀希望。她不仅照顾好家里人,而且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她同意凯西随一家人逃难,帮助比他们更饥饿的邻居的孩子,表现出劳动妇女无私的高尚品质。这位劳动人民的母亲不仅善于体谅别人,而且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劝说乔德,不要单枪匹马去对付警察,要参加集体行动。乔德打死警察、准备外逃时,她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穷人的路“越走越宽”,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朝前走”。这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是本书写得最好的人物。

斯坦贝克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现了从“我”到“我们”的主题,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工人阶级转化。

《愤怒的葡萄》出版之后,引起美国各州统治集团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有的议员出来指责;俄克拉何马州阻止电影公司去拍电影。有一个人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取名《快乐的葡萄》,内容是说一户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亚时生活很贫穷,后来银行给他们贷款,农场主欢迎他们,给他们土地,他们经过辛勤劳动,变得富裕起来。据说这是为了“揭穿”斯坦贝克的“谎言”。事实究竟怎样呢?据到那里去拍电影的人说,流浪农业工人的苦难远远超过斯坦贝克的描写。所以,《愤怒的葡萄》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它的积极影响并不因为抵制、禁读、诬蔑而消失。

《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学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学是美国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流。一般说,凡是反映了当时群众斗争的作品,都属于左翼文学之列,包括党员作家和像斯坦贝克那样的非党作家的作品。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亨利·罗思的《称它为睡眠》(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6)、詹姆斯·法雷尔的《斯达兹·朗尼根》三部曲(1932—1935)和

理查·赖特的《土生子》(1940),分别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犹太人、工人和黑人的斗争。斯坦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经历描写了经济危机期间广大农民的苦难和斗争,代表了左翼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说,《愤怒的葡萄》可以列入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范围,不等于说斯坦贝克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斯坦贝克同情破产的农民,支持他们团结起来,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斗争,但是他把主要责任推在州政府的身上,并且把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对立起来,借用人物的口赞扬联邦政府的收容所,说那里“有洗澡间和热水”,“没有警察”,“大伙儿自己当警察”,因此,流浪的农业工人“喜欢这个地方,大家在一起过得挺好”。

作者把联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浪的不是个别的农场主,不是警察,也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而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给了大公司侵占、没收个体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多办一些收容所,农民的处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收容所能容纳上百万破产的农民,这也不是劳动人民应该容忍的生活条件。斯坦贝克目睹这些惨状后,曾向政府提出给农民“分配小块田地”、“确定工资标准”和“不准镇压”等三项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如果书中描写的那些农民能够各自占有“小块田地”,他们又何苦流浪?他们破产了,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不可能“确定工资标准”。斯坦贝克的本意无疑是善良的,真诚的,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的解决办法是调和的,妥协的。正如有一位批评家所说:“仔细读来,《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产阶级放规矩一些,聪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状况。”(彼得·里斯卡著《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贝克看来,“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J.R.布赖厄编《美国现代文学十六家》)



在艺术风格方面,《愤怒的葡萄》不同于作者的早期作品,它没有那么浓厚的泥土气息,却满怀同情和愤慨,充分地、真实地写出一个饥馑的三十年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所擅长的抒情描写变成激情洋溢的文字,在强烈的对照中见出义愤:

腐烂的气息弥漫了全国。

咖啡在船上当燃料烧。玉米被人烧来取暖,火倒是很旺。把土豆大量地抛到河里,岸上还派人看守着,不让饥饿的人前来打捞。把猪宰杀了埋起来,让它烂掉,渗入地里。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垮台。肥沃的土地,笔直的一排一排的树,坚实的树干,成熟的果实,全都完蛋了。患糙皮病快死的孩子们非死不可,因为农场老板得不到橙子的利润。验尸员在验尸证书上必须填上“营养不良致死”,因为食物只好任其腐烂,非强制着使它腐烂不可。

人们拿了网来,在河里打捞土豆,看守的人便把他们拦住;人们开了破汽车来拾取抛弃了的橙子,但是火油却已经浇上了。于是人们静静地站着,眼看着土豆顺水漂流,听着惨叫的猪被人在干水沟里杀掉,用生石灰掩埋起来,眼看着堆积成山的橙子坍下去,变成一片腐烂的泥浆;于是人民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场失败;饥饿的人眼里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而对于劳动人民之间的情谊,却又写得这样亲切,这样富于寓意。这是乔德的妹妹罗莎夏在给一位素不相识的、饿得奄奄一息的人喂奶:

在那响着细雨声的仓棚里,罗莎夏呆呆地坐了一会。然后她把困乏的身子挺起来,裹上那条被子。她慢慢地走到那角落里,站在那里低着头,望着那张憔悴的脸,看着那双鼓得很大的、吃惊的眼睛。随后她慢慢地在他身边躺下。他慢慢地摇摇头。

罗莎夏把那条绒被松开了一边，露出她的乳房来。“你得吃一点才行，”她说。她扭动着身子靠拢他。把他的头拉了过来。“吃吧！”她说。“吃吧。”她伸手到他的头下面，把它托着。她的指头轻轻地搔着他的头发。她看看上面，又看看仓棚外面，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

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者赞扬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像的创作，表现出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这一评语点出了《愤怒的葡萄》的特色。

董衡巽

第 一 章

俄克拉何马的红色原野和一部分灰色原野上,最近不紧不慢地下了几场雨,雨水并未冲裂结了一层硬壳的土地。耕犁在雨水流过的印迹上来回地划了一列列的犁沟。最近这几场雨很快就催起了玉米,并使大路两边处长出了野草,于是灰色原野和深红色原野开始呈现一片绿色。五月下旬,天空渐渐变成灰白,入春以来,长久悬在高空的一团团浮云消散了。太阳天天逼射着成长中的玉米,使每一片绿色托叶的边缘上都出现了棕色线条,并逐渐扩展。天上的云出现后又飘散了,有一段时间再也不见踪影。野草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存,变成了深绿色,再也不蔓延了。地面结了壳,一层薄薄的硬壳。天空变成灰白,大地也跟着变成了灰白,红色的原野变成了淡红色,灰色的原野变成了白色。

在雨水冲成的沟渠中,细土像流水似的直往下滚。土拨鼠和蚁狮一活动,尘土就像雪崩似的坍了下来。酷烈的太阳天天照射着,稚嫩的玉米叶子没有原先那样坚挺了,这些叶子起初变成弧形,随后因为叶脉逐渐虚弱的缘故,每片都斜倒下去。后来到了六月,阳光更为酷烈。玉米叶子上的棕色线条扩展到了叶脉上。连野草也蔫了,叶子朝根部搭拉下来。空气稀薄,天色更加灰白;大地也一天比一天变得灰白。

在车马往来、路面被车轮磨损和马蹄践踏的大路上,干结的泥块化成了尘埃。地面上的各种活动都会把尘土扬到空中:步行的人把



薄薄的一层尘土扬到齐腰一般高，大车把它扬到篱笆顶端，汽车则在后面滚起一阵尘雾。这尘土很久才会落下来。

六月过了一半，得克萨斯和墨西哥海湾的天空中泛起了大块大块的云，高高的、含雨的浓云。田野上的人们抬起头来望着这些云，用鼻子去闻一闻，伸出湿润的手指去辨辨风势。天上飘着云的时候，田野上的马都有些着慌。浓云洒下几点雨，便匆匆忙忙地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云飘走以后，天空又恢复了灰白色，太阳依旧像烈焰般照射着。只是尘埃中间雨点落到的地方有了一些凹穴，玉米上有了一些澄清的水珠。

一阵和风追随着雨云，把它们赶向北方，轻轻地吹动着正在干枯的玉米。一天过去了，风渐渐大了起来，但风势还很平稳，不是一阵阵的。大路上的尘埃飞扬起来，落在田边的野草上，落在附近的田地里。现在风更大了，刮着玉米地里雨后干结的地面。天空弥漫着尘土，愈来愈暗；风掠过大地，卷起尘土送往别处。风越刮越猛。雨后干结的地面裂了开来，田野上的尘土飞扬到空中，形成一道一道灰色的烟雾。玉米迎风扑打着，发出了呼啦啦的干涩声响。最细的尘土现在已不落回大地，而是消失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中了。

风越刮越猛，在石头底下吹过，卷起稻草和枯叶，甚至还卷起小土块，在掠过田野的时候留下了它的踪迹。天空很昏暗，太阳已成了一团红光，空气中有一种刺人的阴冷感。夜里，风以更快的速度掠过地面；它在玉米的根脚间灵巧地掘着，玉米用它软弱了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于是每一根茎秆都横倒在地上，标志着风向。

黎明到来了，白昼却不露面。灰蒙蒙的天空出现了一轮红日，那只是一个朦胧的红色圆盘，放射出微弱的光线，好似黄昏一般；再过些时，阴暗的天色重新变成了一片漆黑，风在伏倒的玉米上呜呜地悲鸣。

男男女女都挤在自己的家里，出去的时候都在脸上扎了手帕盖住鼻子，还戴了风镜保护眼睛。

一到夜里更是漆黑一团,因为星光没法穿过尘沙照到地面,窗内的灯光甚至还照不出院落。现在,尘沙和空气匀称地搀杂在一起,成了尘沙和空气的混合物了。家家户户都紧关着门窗,用布塞住了缝隙,然而细得连肉眼也看不出的尘沙还是钻进来,像花粉一般停积在桌椅上和碟子上。人们从自己的肩膀上把尘土掸下来。门槛上也积聚着一行一行的尘沙。

夜半,风止了,地面平静下来。尘沙弥漫的空气所起的隔音作用比雾还大。睡在床上的人听见风停了。他们是在大风平息之后醒来的。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在沉寂中凝神谛听。一会儿,鸡叫了,啼声也是沉闷闷的,人们在床上辗转反侧,巴望着天亮。他们知道空中的尘沙得经过好久才能澄清。早上,尘沙像雾一般笼罩着,太阳红得像鲜血一样。尘沙整天像从天空中筛下来一样,到第二天还是往下筛落,给大地铺了一床平整的毯子。这尘沙落在玉米上,积在篱笆顶上,堆在电线上;它也落在屋顶上,覆盖在野草和树木上。

人们从家里出来,嗅到了热辣辣的刺鼻的空气,赶紧掩住了鼻子。孩子们也从家里出来,却不像雨后那样奔跑着或是叫喊着。男人们站在他们的篱笆旁边,看着受灾的玉米正迅速地干枯下去,只有少许绿意从尘沙的障翳下透出来。他们沉默着,不大动弹。妇女们从家里出来,站在自己的男人身边——悄悄窥测他们这回是否会完全泄了气。妇女们偷偷地打量着男人们的脸色,只要他们不气馁,玉米没有收成也不要紧。孩子们站在旁边,用光着的脚趾头在尘沙上画着图,暗自留意着大人们是否会泄气。孩子们窥探着大人们的面孔,又用脚趾小心地划着线条。马儿来到水槽边,用鼻子拨开水面的尘沙喝水。过了一会儿,那些呆望的男人们的脸上失去了迷惘的神态,变得勇敢、愤怒,有应付困难的决心了。于是妇女们知道她们已经平安无事,男人们不会泄气了。她们问道,我们怎么办呢?男人们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妇女们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些呆望着的孩子也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妇女们和孩子们都深深地知道,只要家里的男人挺得住,他们就再没有忍受不住的灾难了。

妇女们走进屋去做活，孩子们开始玩耍，但是起初玩得很小心。这一天太阳升得越高，它的红色也褪得越多。强烈的阳光照射着尘沙覆盖的土地。男人们坐在自己的家门口；他们手里拿着小树枝和小石头，忙着在地上写算。男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着——算着。



第二章

一辆巨大的红色运货汽车停在路旁一家小酒铺门前。立式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从车尾冒出一股几乎看不见的青烟。这是一辆闪亮的红色新汽车，两旁漆着几个十二英寸见方的大字——“俄克拉何马城^①运输公司”。汽车上的双轮胎是崭新的，后边大车门的搭扣上显眼地套着一把铜挂锁。那家装着铁纱门的酒铺里，有一架收音机奏着柔和的舞曲，声音已经照没有人听的时候那样拨小了。大门顶上的一个圆洞里，有一架换气的小风扇静静地转着，苍蝇在门窗外急躁地飞着，扑打着门上的铁纱。酒店里面只有一个男人，也就是那个货车司机，他坐在一张圆凳上，胳膊肘放在柜台上，从咖啡杯上抬头望着那清瘦而又孤独的女招待。他跟她谈着一些得体的、无聊的闲话。“我在三个月以前看见过他。他动了一次手术。割掉了一点东西。割掉的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于是她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离现在好像还不到一个星期。那时候他看上去身体还很好。他只要不喝醉，倒是个很不错的家伙。”苍蝇不时地在铁纱门外嗡嗡地响。咖啡壶喷着蒸汽，女招待连看也不看，便伸手到背后，把它关掉了。

外边，一个沿着公路边上走路的男人穿过公路，向汽车走来。他慢腾腾地走到汽车前面，把手放在锃亮的挡泥板上，朝挡风玻璃上“不准搭车”的条子看了一眼。他刚想顺着大路继续往前走，但略一踌躇，终于在背着酒铺那一边的踏板上坐了下来。他还不出三十岁。